

听袁正声上党课 陈中 小群 原高洪  
清华老人何伟武：不敢乐观也不敢悲观 吴 子  
“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开始” 马国川  
对话：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 于建嵘 樊富珉  
人文学科的发展不能被纳入“计划” 田波湖  
张五常：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 章剑华  
“官营财产公开”在湖北一个县级区的实验样本 古才强  
市长“毒”党 冉 金  
瓦利副市长与杭州地产十年 洪明会  
海南东方市土地腐败黑色链 王烁博 李 敏  
国家烧钱的三起“吉林制造” 王立三  
假日记“瞒报”真局长 刘子伟

2011

# 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China Report 2011

向继东 编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 向继东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376-1

I. ①2… II. ①向…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7360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欧阳衢 林 菁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25 2 插页  
字 数 426,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CONTENTS 目录

序 向继东 1

## 人 物

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	陈中小路	徐燕燕	1
清华老人何兆武：不敢乐观也不敢悲观		灵 子	7
“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开始”			
——对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马国川		13
对谈：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	于建嵘	裴宜理	19
人文学科的发展不能被纳入“计划”			
——访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	田波澜		25
张五常：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	章剑锋		31

## 吏治（上）

“官员财产公开”在湖北一个县级区的实验样本	占才强		39
州长“毒”史	冉 金		45
死刑副市长与杭州地产十年	吕明合		51
海南东方市土地腐败黑色剧	王维博	李 敏	58
国家赔偿的三起“吉林制造”	王立三		64
假日记“瞄准”真局长	刘子倩		68
阳泉巡警涉黑案或引官场震动	陈宁一		73
一名公务员的“申冤反腐路”	吴通清		78

## 吏治（下）

禁毒大队长的“最后一战”	曹 勇	85
警界“无间道”——郴州公安局里的生死暗战	曹 勇	92
附：“郴州官场的良心”	傅剑锋 鞠 靖	100
“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		
——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	李 梁 整理	105
江西抚州爆炸案调查——疑犯遭强拆上访十年无果	凌子梦	112
抚州维稳之惑	柴会群	120
抚州“病人”——爆炸案知情者进了精神病院	柴会群	125

## 世 相

郑州地产商竞选市长之后——从亿万富翁到躲藏的逃亡者	陈 磊	133
枪决九年后死囚还“活着”	刘 虎	138
邵氏弃儿：被计生部门“没收”的婴儿	上官敦铭	144
盲井·盲流·盲山——四川雷波圈养智障者上演“盲井”敲诈案	曾 鸣	157
乡镇福利院的“啃老”经	王维博	167
山西版“罗彩霞”蒙尘 14 年	李建军	172
“人耳鼠”真相——质疑者与候选院士的交锋	李 蔚	176
湖南常德抢尸事件调查	钱亚平	181
荒野“逃生”十二年	叶伟民	186

## 底 层

历史的囚徒	邢人俨	193
124 个尘肺病患者的冬日童话	蒋昕捷	201
西海固没有新闻	蒋昕捷	206
“砍手党”：城市里的陌生人	傅剑锋 范承刚	210
码头春秋	郭建光	223
伊力亚的归途	叶伟民 刘 星	231

## 教 育

谁懂我伤悲——一名 10 岁留守儿童自杀背后	周清树	武文超	239	
老师的“样子”——一个中学教师的小说和现实		朱又可	244	
“留学生刺母”背后的家庭拼图	杨迪	崔晓火	249	
教师拿回扣，十万元一年		陈军吉	254	
武大校园蛀虫	陈昭方	叶铁桥	雷宇	259
梧桐山里的私塾聚落	杨正莲	周丽	265	
大学在人间	方可成	李惠普	270	

## 新 知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俄罗斯	闻一	277
吉林延边：朝鲜边境的这个冬天	刘志明	283
高墙里的“老外”	周华蕾	287
老贾的“心灵农法”	鲍小东	292
种子——来自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报告	吴通清	298

# 序

向继东

《南方周末》有句广告词：“在这里读懂中国。”其实，这里借来一用，也是合适的。

这本深度报道集仍和去年一样，分“人物”、“吏治”、“世相”、“底层”、“教育”、“新知”六辑，只是先后排序略有不同。要说有点变化的，就是“吏治”分为上、下两辑了。近年来，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及政策法规，都在强调对官员的教育，要求官员“做官要讲官德”，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近出台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新华社曾以《中国掀起“道德风暴”积聚“向善”力量》为题，大讲“德”之重要——做官讲“官德”，经商讲“商德”，治学讲“学德”，执教讲“师德”，行医讲“医德”，从艺讲“艺德”……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须的。如果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一切没了规矩，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救了。但在我看来，“德”固然是重要的，是维系社会的根基；但法治比德治更重要。试想想，如果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遵纪守法了，整个社会不就风清气爽了吗？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多年前，邓小平就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去年曾有河南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三学生李金川，不满学校师德败坏、世风日下，留下遗书说“我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自己的解脱”而服毒自杀；今年又有西安蓝田县孟村乡大王村一个叫小阳的四年级学生，因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2011年6月15日6时30分左右，小阳摇醒睡在身边的哥哥小东说：“我喝药了，不用去上学了。”每个稍有知觉的人，读了《谁懂我伤悲：一名10岁留守儿童自杀背后》，恐怕都会反思小阳之死。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除了农民工，最苦最累的是学生。除非寄宿，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们总是起早摸黑挤公交。他们每天有做不完的作业，往往忙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没做完，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又要起床。作业做不完，

家长帮着做——大约十年前，我也帮孩子做过作业，而今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了。收入“教育”一辑里的文章，还有深圳“梧桐山里的私塾”，有湖北东南部乡下小镇一所临时的“大学”。这些学校的出现，就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反叛——前者大都是三至十二岁的孩子，在私塾里读的是孔孟老庄等国学经典，外加一天一小时读英语；后者学生都是高中生或是大学里的在读生。前者是对基础教育的不信任，后者是对大学教育的彻底失望，他们自己在寻找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最后要说明的是，收在本书里的文章，都反映了真问题，因而被纳入了我所设定的“框架”内。我喜欢文本好、反映问题深刻又读来富有快感的作品。当然，本书也有一些文本不算上乘，但问题却是抓得很好的。还要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编辑此书的朋友，如叶铁桥、陈磊、鄢烈山、朱又可等，他们帮助我联络到不少好记者，以及所有的记者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这本书。

2011年11月  
于长沙楚天馨苑闲居斋

## 人 物

### 听俞正声上党课

——“执政者的声音”

陈中小路 徐燕燕

#### 一条微博的蝴蝶效应

2011年6月20日下午，一堂特别的党课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坐在讲台上的，是身着白衬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环坐在俞正声面前的，是来自上海交大所有院系所有年级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达5000人之多。

学生们穿着中午发到手上的统一T恤，按颜色坐成一个个红色和黄色方阵，整齐鲜艳。正对着俞正声的方阵，举着巨大的红色标语——“纯洁、坚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上海交大等方面为这堂特别党课反复斟酌敲定的主题，这句话也出现在俞正声上方的巨大液晶屏幕上。

这并不是一场枯燥乏味或是充满宣传动员辞令的演说。这堂近两个小时的党课上，俞正声不仅主动谈起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革”等时期的争议话题，并不时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选择到上海交大上党课，却要从

一条最近网上热议的微博说起。

5月中旬，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大四学生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同学分享了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支部书记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绕这条微博，支部内进行了一场信仰危机的讨论。讨论后，大家决定把“无论何时何地，亮出党员身份”作为这个支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党课的主题。

这个主题针对的是当前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主观上蛮淡漠的，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党员，当有一些是非争辩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表明自己应该持有的立场。”董雪说。

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里其他毕业支部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也给俞正声写了一封倡议信。

出乎董雪意料的是，不仅几天之后收到了俞正声的回信，各方也顺势促成了邀请俞正声来学校上党课的构想。“没想到会搞那么大。”董雪说。

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刚到上海履任不久的俞正声，也曾到复旦大学上过一次“党课”。那一堂主题为“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员本分”的党课，也是“结缘”于一封毕业生的来信。

只是当时那次党课，只局限于两百人左右的毕业生党员代表。而这次，是面对近五千名师生，并且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生日之前，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的党课。

## 关于中共诞生，关于新中国，关于毛泽东

6月20日下午两点左右，5000名师生就座。按计划，各个院系轮番唱起了《歌唱祖国》、《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红歌——曲目是学校提前确定好的，大屏幕上还滚动着歌词。

半个小时后，俞正声走进了体育馆。

“交流是为了讲心里话，念稿子大家不爱听……我今天给大家上党课……没有教育人的意思。”向来不用讲稿的俞正声，这次也不例外，这番开场白先赢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

俞正声说，“我想讲两点，一点是坚定的问题，一点是忠诚的问题。”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的书国内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怎么样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间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随后，以中共历史为脉络，俞正声给学生谈了几个“怎么看”。

他说，“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丧失一点控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时机。很可惜的是，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

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

俞正声说，“报纸上当然没点共产党，但是说救亡图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发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俞正声说，“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的北京的报纸。”

对于这个问题，俞正声举了自己4月在《新华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谈到，1920年，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的宁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后一个月当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报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极有限。

“我到上海以后，感觉很多人对上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很留恋。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国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绿洲。2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了，上海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么？上海的富商们为海原大地震贡献了什么？”

在俞正声看来：“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俞正声强调，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中共诞生，就是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就是不能让社会、官僚们熟视无睹群众死活的状况在中国继续下去，所以才产生了共产党。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有人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上比国民党高，我觉得是不对的，根本上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俞正声随后谈到农民参加土改。

“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十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

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俞正声一一数道。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

“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基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此外，俞正声还谈到了当前社会矛盾不断地涌现。他说，“有一些社会矛盾是属于干部处理经验不足，没有在早发阶段赶紧处置；有一些社会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来没那么大。”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俞正声也历数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阶段性的混乱。而这种快速发展、分配上的变化、财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

“这是正常的。”俞正声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新世纪利益多元多变，是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都难以避免的。

还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分工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还强调，这不光发生在中国。

“第三，还有我们工作的不足和体制的缺陷。”俞以分配问题为例，他说，邓小平1993年就讲过，分配问题可能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应该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鼓励用各种方法去进行探索。“我想我们对小平方针的认识和实践上做得不够。”

“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声顿了一下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俞正声告诉听众，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准，他每个月工资一万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长韩正低一些。“抽烟是自己买，衣服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

俞正声也提醒说，（解决当前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建国以来的教训是什么，是急于求成，以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是GDP赛跑，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投资、那么大的货币量。”

“我们总要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就是靠各方监督的办法。”他甚至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检查工作，结束后随行人员邀请他去看看当地一个湖。当时，大量游客在那，俞正声一行至少有四五辆车就开上去了，然后上了船。

俞说，从船上下来，游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这段自嘲，也引得学生一阵大笑。

因此，“还是要扩大公开，置于群众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方面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 主动谈起敏感话题

谈到当下，对于一些政治领域的敏感话题，俞正声也向学生们主动说起。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说，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内地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内地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

“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俞正声抛出一串反问。

他强调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俞正声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在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

有意思的是，曾经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与来自湖北潜江的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之间，还有一段交集。

俞正声回忆道：“我在湖北时，潜江的书记说，我们有一个群众推荐的候选人选上了，经常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区分情况，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分析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是要支持的；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经验，有时候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出于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

俞正声问这位书记，姚立法处于哪种状态？他说，还没有到第四种。俞说，你还是要帮助争取，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只要他讲得对，你们都要改正你们的工作缺点，即使是不对，你也得改正你的缺点。“后来县里说，美国国务院请姚立法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问怎么办？我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

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

俞正声说，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在于他给你提多少意见。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中国的现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岁了，干不了几年了，你们都是年轻党员，未来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你们决定的。希望你们把握好未来的政治方向。”

“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不会有希望。”

俞正声还向学生谈起“忠诚”的话题。“我说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不是一句空话，体现在很多的思想里。”

“在座的有不少上海人，上海现在常住人口将近三分之一是外地人，要不要取得上海户籍？要不要享受跟上海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俞正声说，“同学们是心里赞成还是表面赞成啊？这势必会涉及到一些利益。我们现在的高中不允许他们上，势必有一天，高中要给他们开口的，高中要开口子，等于大学也要开口子，大学开口子，等于原上海籍的高中生考大学就有竞争了，上海户籍的同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啊？”说到这里，他批评说，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太慢，有关部门的同志思想局限太重。

他停了一下，说道，“作为党员，就应该赞成。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也不敢贸然地进行，上海老百姓很有意见。慢慢地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

他随后提到，忠诚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他举例说自己在山东任职时，有一年山东的走私很厉害，大量走私汽车。“我当时在青岛担任市委书记，青岛刹住车了，威海、烟台都疯了。正好到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

他随后还举了一个有关朱镕基的例子：“朱总理是好领导，你不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讲真话，他反而相信你。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对朱总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鼓励你讲真话。”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在学生的欢笑和掌声中，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原载《南方周末》2011年6月23日）

# 清华老人何兆武：不敢乐观也不敢悲观

灵子

## 不敢乐观也不敢悲观

何兆武先生今年秋天就 90 岁了。他的一些清华同仁现在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庆祝，“既能有所动作，又能让老先生接受”。这么说，是因为十年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曾要借他 80 大寿之机，搞个何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早晨去家里接人，却发现他早已锁门走了。

这次提到 90 大寿，话未说完，他便摆手，笑眯眯道：不搞不搞。

某一次的访谈中，他曾郑重其事地说：“我做的都只是自己的兴趣而已，我希望淡化自己，边缘化自己。”

谈天时，他习惯双手抱着搪瓷杯子在胸前，头略抬起，眼睛向远处望着虚空，思索。即便沉默的时间里，嘴角依然上扬，微露牙齿，一副不变的笑模样。隔了好一会儿，开腔：“哎，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换了四个专业：土木、历史、中文、外文。旁人羡慕他在《上学记》里回忆的这段自由，他却说这是一大遗憾，“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规划，所以一生荒废了，做不出成绩”。

老先生自己以为“荒废了”的“一生”，包括任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研究之外，他还从事哲学及思想史研究，并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他曾以寥寥百字概括出中西史学思想的不同：“中西思想之区别在于西方走的是机械的、分析的道路，从原子（或个人）出发；中国走的是有机的、综合的道路，从‘场’（或集体）出发。故在西方，个人是目的，集体是手段；而在中国，则个人是工具，集体是目的。”

这样一个老人，常说的句子却是“我不懂”。

比如，“我不懂，现在有的小地方一贪污就是多少亿，他哪有这么多钱可贪？怎么这个贪污就整治不了？”

语调温和敦厚，全无戾气，却是满腔担忧。

## 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

灵子：今年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您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转到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任职，与这所学校渊源颇深。在您的理解中，清华精神是什么样的？

何兆武：清华最初是美国人的庚子赔款建成的，建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而是留美预备班，送出去留美的学生都要在清华先经过训练，出国后好跟美国接轨。所以清华里面的建筑都是美国式的，直到我们上学的时候，除了国学、历史方面的课程，其他也都是美国教材。

解放后，全面学苏联。苏联的教育是专家教育，高等教育都是专科教育，如航空学院、煤炭学院。解放以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都变成专门的院校，学生一进学校专业都非常明确，将来就是地质专家、钢铁专家。这时候清华就变成工科大学，文科、理科都并到北京大学去了。后来大概又觉得工科大学的设置跟世界潮流不太符合，所以八十年代初期又改回综合大学。

不过，1986年我再回清华的时候，感觉综合的程度还不够，还是工科独大。

灵子：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有国学研究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汇集，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何兆武：当时还没有大学，后来建了大学，就把国学研究所拆了。北大也是，本来有经学系，也就是今天的国学，蔡元培做校长时就把经学系拆了。经学系无非是研究义理、辞章、考据。研究义理的，分到哲学系；研究辞章的，都到中国文学系；研究考据的，都到历史系。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撤销，也是分到这三个系里去。

现在又开始兴国学了，我不知道国学系和文科其他的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灵子：不光学院里有国学热，天安门还立了孔子像。

何兆武：（笑）这好像在翻“五四”的案，“五四”是打倒“孔家店”。“文革”的时候，到曲阜去把孔子的墓都扒了。我们过去折腾得太厉害了。这样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

我觉得不要太过分，比如现在让小孩儿都穿上古代的衣服，没有必要，现代人就穿现代服装，不必要穿古代服装。穿了古代衣服，并不代表就是继承传统。

灵子：最近清华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致学校的信，提到现在的清华学生是体制和教育的利益既得者，许多人毫不犹豫地捍卫着“主流价值观”，缺乏独立思考。您怎么看清华百年来的这种变化，从独立自由到现在的“既得利益者”？

何兆武：这个应该考虑到新旧社会的不同。

新中国建立之后，体制跟旧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的学校是党领导一切。旧清华是教授治校。它虽然也是国民党政府之下的，但国民党并不直接领导。比如我做学生的时候，校长梅贻琦也是国民党员——那时规定大学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但我从没有听他讲过蒋委员长或者三民主义之类的话。

再比如，张奚若先生教授政治思想史，指定的必读参考书里就有马克思的《共

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后来在历史所，还有年轻人问，你们那时候看得到《共产党宣言》吗？我说我就读过。他问，不是不许读吗？我说大街上是不公开卖，但是图书馆看得到。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不受外界干扰。作为学术，都可以探讨。

灵子：前些日子，一个关于清华的热点是悬而未决的“抄袭事件”，您怎么看？

何兆武：是不是抄袭我不知道，但这可以审查嘛。是抄袭，当然给他处分，如果不是，等于给他“平反”。现在对于抄袭，好像往往是这么解决，说是“不规范”，不叫作弊。北大有位教授翻译了一本书，然后把译文里面八万字整个加到他的著作里，作为自己的著作。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这个问题，我们的领导也有责任，因为没有摸索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来评定水平。现在过分重视数字，所以抄袭也不足为怪。学校规定一个研究生一年要发几篇论文，这一点我不赞成，这等于让他们想办法凑论文，凑不成就拿钱买版面，给人家送广告。不能这么干。

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照这么说牛顿根本不用评了。而且万有引力定律搞了十七年，按照我们的规定他十七年都评不上。爱因斯坦晚年要搞统一场论，结果没有成功，但他仍是第一流的学者。放在我们现在的体制里就行不通。

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等于转到一个新的轨道上来，可是还没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新的办法。

## 到底是为什么出现了一场“文革”

灵子：没有摸索出办法，是因为时间还太短吗？

何兆武：按说也不短了，30多年了还走不出来？抗日战争的时候北大清华也不过三十几年的寿命嘛。你看那时候曹禺写《雷雨》，就是做学生时在图书馆里写的。现在的学生不太可能了。如果写小说、剧本，就是不务正业。

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许多人新中国成立前产量很多，解放后都不见了，不光曹禺一个人。比如何其芳，作家，出了好几本书，很轰动，解放后不见了，大概是去搞政治了。还有范长江，有名的记者，北大没毕业就轰动全国，解放后也没有写什么东西了。其实他挺有才的，为什么不让他写了？是不让他写了，还是他不写了？（如果是）他不写了也要问：为什么不写了？

何其芳后来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整天挨斗，为什么不能叫他发挥特长呢？我那时在河南下干校三年，文学所的人也都去了，俞平伯、钱锺书，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下去干什么？后来叫钱锺书去送信，整天背个包到处走。我心想这个活儿你找个中学生就可以干嘛，为什么不叫他随便写点东西呢？俞平伯更不行了，七十多岁，下去就叫他搓麻绳，我觉得有点浪费人才。你叫他在北京随便做点什么，研究点红学，总有益处吧。

尤其对燕京大学的陆志韦，是带点惩罚性质的。他那时候 80 岁了，下去以后样子非常惨，穿得破破烂烂，左手拿一个棍子，走路颤颤巍巍，右手拿一个饭碗去打饭，看上去就像乞丐。一个 80 岁的人了，我觉得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

灵子：那您说这是为什么？

何兆武：那时候就说是劳动改造嘛。其实究竟改造了多少，也没法衡量。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有个外甥是北大法语专业的，“文革”时期下乡，搞阶级斗争，揪一个老地主来斗。他们就想，我们学了法语，有什么用呢？用法语斗（地主）吧。那天就开一个法语斗争会。斗争完了，问那个老地主，你有什么感想？老地主挺会说话，说我经历过很多斗争，就是今天这个斗争印象最深刻。这有点像开玩笑。

灵子：您在“文革”期间有没有被批斗？

何兆武：我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资格革人家的命，只能等着别人来革我的命。别人来抄过我家两次。不过那时候是根据职称划线，凡是职称副研以上的都算是反动学术权威，我那时候是助理研究员，所以还好。当然后来也被揪出来，躲不了。

我对“文革”还是不大了解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场“文革”？我虽然亲身经历过来，但不了解内情。

我离休以后看的书主要是“文革”时期的回忆录，聂元梓的，陈伯达的，手头有的都看了。我觉得“文革”的当事人现在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都推在江青的身上，这一点我不很同意。当然江青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她一个人不可能包办。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江青是组员，但他说什么都听江青的。事实可能是这样，但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好像也不太说得过去。

最可惜的是没有叫江青写一本回忆录，可以给她派两个人去，每个礼拜谈一次，把谈话内容整理出来。江青如果说假话，也照样记录，因为总可以弄清楚。

“文革”时给我戴了“反革命”的帽子，后期给我平反，写得非常简单，就是何兆武同志没有政治问题，“过去所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撤销，予以平反”。完了。也没有说是谁给我加的“诬蔑不实之词”。

灵子：您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

何兆武：来自革命群众的就不说了，比如说我吃面包是崇洋媚外。正式落实的有两条，一条是我们排长宣布我“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不喜欢看样板戏。我觉得中国京剧只适合演绎古典的神话，不适合演现代生活。比如《沙家浜》里面，一个人养好很多伤兵，自己家里开茶馆，还要跟敌人作斗争，太不真实了。我倒没有攻击江青，但这也算罪状。

另一条是我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罗素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交给我的，他们的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和我是同班同学，很熟，在运动以前常有来往。运动期间不敢接触，互相都怕连累对方。运动以后恢复联系，她告诉我，这本书是毛泽东交译的。

二战以后，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个人合搞世界和平运动，搞得很火热，实际是针对美帝的世界霸权，所以我们很欣赏。尤其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是亲身经历过